



# 论近代生活在中国境内的犹太人与 当时中国人之间的交往

——以对哈尔滨犹太人的历史考察为例

王志军\*

本文以哈尔滨犹太人为例,认为近现代生活在中国境内的犹太人与中国人的交往,总体上说数量不多、深度有限。这应该是人们认真研究近现代中犹两个民族间相互交往、相互影响的重要前提。只有在这一前提之下,我们才能较为正确地理解一些学者的论述和当事人的回忆。造成哈尔滨犹太人与中国人交往不多、交往不深的原因与近代中国的国际地位、远东的地区局势、犹太人自身的凝聚力、社区的封闭性、在哈尔滨生活的时间长短等都有密切关系。

犹太人原是闪族语系的一支,名为希伯来人(Hebrew),最早生活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亚伯拉罕(Abraham)是其传说中的先祖。从公元70年罗马焚毁耶路撒冷犹太圣殿到纳粹惨绝人寰的集体屠杀,这个从公元135年至1948年已经没有任何地域性色彩的被“连根拔起的民族”<sup>①</sup>,正是在离散寄居的状态下,与世界上诸多其他民族发生或多或少的联系交往。

## 一、问题的提出

犹太人在中国定居的历史是悠久的<sup>②</sup>,多数学者认为,唐代已有犹太人为贸易来华。17~18世纪之后,唯有当时河南开封的犹太人,尚能形成一个比较强

\* 王志军,黑龙江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① 参见汤因比:《历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4页。

② 参见S. M. 伯尔曼:《在中国的犹太人》(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1909年印行,第3页。

#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4辑

大的民族和宗教社团。19 世纪中晚期,开封犹太人的外部特征基本消失。<sup>①</sup> 与此同时,伴随着鸦片战争、中东铁路的修建等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又有大量塞法迪犹太人和阿什肯纳兹犹太人来到中国,其中以上海、哈尔滨的犹太人数最多、影响最大。上海最早的犹太人社区要早于哈尔滨犹太人社团,他们是从英国统治下的巴格达、印度和新加坡等地来到上海的。早期的这些上海犹太人颇具经济实力,他们与多方政治力量具有良好的关系。从 19 世纪中期犹太人涉足上海到 20 世纪 50 年代初离境的大约 100 年间,上海先后出现过 4 个大的犹太社区。它们分别是塞法迪犹太社区、俄罗斯犹太社区、中欧犹太社区和波兰人犹太社区。上海的犹太人相当部分是难民群体,其中一部分是俄罗斯犹太人;另一部分是从欧洲东逃到上海的犹太人,自 1934 年起,特别是 1938~1941 年,2 万多人历经艰难来到了上海,这是德国等法西斯分子反犹运动迫害所致,他们中的 5000 人后来又从上海到其他国家去了。<sup>②</sup> 哈尔滨的犹太人最早是由于沙俄修建中东铁路,从俄罗斯、乌克兰、波兰、立陶宛等国家或地区来到哈尔滨的。日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十月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又有大量俄籍犹太人或因生活所迫,或因进行商业活动,或因躲避战火来到哈尔滨,其人口在 1920 年左右达到了 1.5 万人左右<sup>③</sup>,成为拥有会堂、墓地、银行、学校、图书馆、医院、福利救助机构和许多工业贸易企业的完整的犹太人社区,甚至一度使哈尔滨成为犹太人在远东地区最大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迎来了哈尔滨犹太人的一个黄金时期。1945 年 8 月,苏联军队进入哈尔滨,哈尔滨犹太人社区的许多重要成员被逮捕、流放或暗杀,社区受到最严重的打击。<sup>④</sup> 总之,到了 20 世纪 30~40 年代,中国境内的犹太人大约有 4 万人,除去上海、哈尔滨外,其他地区,如天津、香港、大连、青岛、齐齐哈尔、满洲里、沈阳、横道河子等地也有数量不等的犹太人。学者们对于这些生活在中国境内的犹太人与中国之间的交往关系,进行了许多研究。例如,中国犹太人研究著名学者潘光认为,上海的俄罗斯犹太人绝大多数属于俄系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与塞法迪犹太人相比,“他们(上海俄罗斯犹太人)在了解中国、熟悉中国文化方面更加积极和主动,与中国各

① 参见米歇尔·鲍克:《满清官员、犹太人和传教士》,美国犹太人出版协会 1980 年版,第 318~319 页;耿昇:《西方人对中国开封犹太人的调查始末》,《河南大学学报》2007 年第 3 期。

② 参见唐培吉:《上海犹太人》,上海三联书店 1992 年版。

③ 参见《犹太生活》(1938 年 1 月 14 日第 1~2 页和 1938 年 1 月 27 日,第 3~4 页)、《西伯利亚—巴勒斯坦》(1922 年 1 月 27 日,第 4 页)。转引自 Jonathan Goldstein (ed.), *The Jews of China*, Vol. 1, New York, 1999, p. 191

④ 参见西奥多(特迪)·考夫曼:《我心中的哈尔滨犹太人》,刘全顺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01~122 页。



阶层人民的接触和交往也更为密切”<sup>①</sup>。哈尔滨犹太人“大多数人愿在中国长期居留下去,有些人还申领了中国护照。他们努力适应中国文化,不少人学会了说中国话,还有一些人与中国人通婚”<sup>②</sup>。他强调,“俄国犹太人与中国人通婚的要比塞法迪犹太人多得多,这也是俄犹与中国人关系密切的一个表现”<sup>③</sup>。这里,我们不评价上海俄罗斯籍犹太人与中国人交往的这些看法正确与否,但是我们认为,哈尔滨的犹太人(大多数为俄罗斯犹太人)总体上并不存在上述情况。换言之,从原居中国的犹太人的回忆和大量相关研究资料看,哈尔滨犹太人与中国人的交往是相当有限的,表现为交往事件数量的有限性和交往内容的有限性、表层性。

## 二、哈尔滨犹太人与中国人交往的典型事例

让我们先浏览一番当年哈尔滨犹太人与中国人交往的典型事例,这对于我们问题的讨论有着重要意义。

**例 1** 以色列前总理奥尔默特(Ehud Olmert)与中国有着特殊的情感,因为他的祖父母与父亲(莫迪凯·奥尔默特,Mordechai Olmert,1911~1998)都曾是生活在哈尔滨的犹太人。俄国十月革命后,为了躲避灾难,奥尔默特全家来到中国东北(当时称为“满洲”)。与其他犹太人不同,莫迪凯·奥尔默特坚持在中国的中学,而不是俄国的高级中学学习。为筹集回到巴勒斯坦的路费,莫迪凯在1929年(当时他19岁)时,从哈尔滨工业技术学院(哈工大前身)来到哈尔滨附近双城堡的中学教中国学生俄语。从1929年12月至1930年11月,莫迪凯在双城中学的教学工作持续了整整一年,他“接受了丰富多彩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与中国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sup>④</sup>。这也是我们所能发现的哈尔滨犹太人与中国人交往的最精彩乐章之一。2004年,以色列前总理爱胡德·奥尔默特到哈尔滨给祖父母扫墓,他曾说“记得父亲经常向我们讲到他在哈尔滨的日子。他还总是引以为豪地说起他曾经在一所学校为他的中国学生讲中文的经历。直到在

① 潘光:《近代以来中国境内的中犹文化交流》,潘光主编:《犹太研究在中国(三十年回顾:1978~2008)》,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年版,第284页。

② 潘光:《俄国犹太人来华潮流和哈津沪俄犹社团的形成发展》,潘光主编:《犹太研究在中国(三十年回顾:1978~2008)》,第242页。

③ 潘光:《近代以来中国境内的中犹文化交流》,潘光主编:《犹太研究在中国(三十年回顾:1978~2008)》,第285页。

④ 韩天艳、程红泽、肖洪:《哈尔滨犹太家族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16页。

#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4辑

88岁去世时,他留在世间最后的话还是用中文说的”<sup>①</sup>。奥尔默特家族的故事,曾被中国的许多媒体引用来证明中犹人民友谊地久天长。

**例2** 柏林爱乐乐团第一小提琴手和乐队首席赫尔穆特·斯特恩在20世纪30年代为逃避纳粹的迫害,跟随父母来到中国,在哈尔滨等地度过11年,哈尔滨成为他的第二故乡。这位后来的音乐大师从哈尔滨起步,开始学习音乐,传播音乐,为音乐献身,最后成功地把自已的顶级的音乐奉献给了全世界爱好音乐的人们。他多次表示,自己始终对中国哈尔滨有着一种思乡之情。在他眼中,“中国人提供各种服务。他们干的活主要是充当厨子和仆役、奶妈和街头小商贩。当然他们当中也有生活优裕的人,有很富的商人。在俄国人和欧洲人市区与中国人市区之间的社会联系带有完全的经济色彩。欧洲人特别是俄人对待中国人的态度,始终带有某种殖民主义者的傲慢印记”<sup>②</sup>。

**例3** 前犹中友好协会会长特迪·考夫曼回忆道:“我们与中国人有联系,但总体上是商业性的。我们每天在大街上和商店与中国人见面,一些中国孩子在高中与我们共同学习,我们经常一起在学校后院里玩耍。但是,我们没有渗透到相互的文化中去。当时,尽管学校开设汉语课,但只有一小部分犹太人能够正确而流利地讲汉语。随着日本人的到来,我们又开始学习日语。我们依然遵循俄国的生活方式,我们所雇仆人主要是俄国人和中国人。中国人厨艺高超,他们有的来自附近村庄,有的是由于逃避饥荒而至的山东灾民。他们不但勤劳而且忠诚。工作了10年后,我们雇用的厨师决定返回村庄。他并非为我们做中餐,而是为我们准备东欧传统食物及‘科舒尔’(适合犹太人的、符合犹太教规的洁净食物)。每年夏季时,厨师宋(Soon)的儿子都来拜访我们。我们同龄,很快成为一起戏耍的好朋友。”<sup>③</sup>在《我心中的哈尔滨犹太人》这部书中,特迪·考夫曼的文字充满了对犹太民族的满腔深情,但是对于一同生活在这座中国城市的中国人的记述却是很少很少。

**例4** 哈尔滨犹太人雅各布·李伯曼的童年和青年时代在哈尔滨度过,他这样回忆道:“在我渐渐长大的时候,我常纳闷,我们在这个城市里继续享受着生活时,中国人正在干什么。这个问题一直困扰了我好几年。几乎没有任何的中国年轻人来分享我们举办的活动,那些成年人好像是位于我们的视野之外,为的

① <http://commerce.dbw.cn/system/2007/06/15/000016274.shtml>.

② 赫尔穆特·斯特恩:《弦裂:柏林爱乐乐团首席小提琴斯特恩回忆录》,李士勋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1页。

③ 西奥多(特迪)·考夫曼:《我心中的哈尔滨犹太人》,刘全顺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8页。



是要完全秘密地远离我们——他们的客人。”<sup>①</sup>所以，他说：“中国不是‘我的’，我也不是中国人……一个人只有母亲是中国人，他才能成为中国人……我们三代来自中国的犹太移民，从来没有认为中国是我们永久的家。我们完全不同于那些前往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的犹太人，在那里他们拥有相同的权利和义务而成为永久性公民。所以，中国只是指一个中介，而不是获得一个国家，是一个人的生命而不是一个抽象的民族历史……那些像我们一样出生于中国的犹太人，我们永恒的记忆既不是中国人，也不是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我们的’中国是我们在远东为获得全面和健康的犹太生活而生活和工作的一个非正式的历史。……我们生活在哈尔滨、天津、上海三个封闭、自我中心的犹太社区超过三代人，既没有整合，也没有同化我们的宿主。在任何其他的背景中，任何其他的人民，这本身足以成为反犹太主义和深深仇恨的原因，但是中国没有，中国人也没有。”<sup>②</sup>

**例5** 亚历山大·马库兹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说道：“犹太人是我的唯一的身份。这就是为什么我的中学毕业证书的民族一栏中写着：犹太人，尽管我事实上是个波兰公民。我早期生命的一半（第一个6~7年）基本上就是生长在哈尔滨犹太社区。我们生活在许多的犹太家庭之中，我到犹太学校上学，在年轻犹太人的组织‘贝塔’中活动，我总要去犹太商店。第二个6年，我生活在世界化的哈尔滨之中：在英国人中学读书，参加俄国人的音乐团体，参加一个日本人管理的、大部分由俄国人构成的交响乐团，同许多国家的教师在哈尔滨基督教青年会。在所有这些组织中，犹太人只是一小部分（常常是相当小的一部分）。我虽然也有一些俄国的、波兰的、鞑靼的、中国的朋友，可是我的大部分朋友还是犹太人，我有时也与非犹太女孩约会。从一个哈尔滨的犹太社区这种部落一样的生活，到较为广阔的没有种族差异的城市生活、国外旅行和我的将来的美国生活，这是一个良好的转变。”<sup>③</sup>

此外，在《犹太生活》周刊里，我们能找到许多关于中国历史、民俗的文章。《犹太生活》甚至还刊登了相当数量的中国记者和政论家撰写的关于犹太复国主义、访问巴勒斯坦、孙中山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态度 的文章及其他资料。<sup>④</sup> 哈尔滨

① 雅克夫·李伯曼：《我的中国：1900~1950 亚洲的犹太生活》，耶路撒冷，1998年，第25、39页。

② 雅克夫·李伯曼：《我的中国：1900~1950 亚洲的犹太生活》，耶路撒冷，1998年，第11~12页。

③ 亚历山大·马库兹（笔名）：《20世纪30年代在满洲里的正在壮大的犹太人：个人回忆片断》，乔纳森·高斯坦主编：《中国犹太人》（第2卷），纽约，2000，第82页。

④ 参见T·考夫曼：《〈犹太生活〉——从在哈尔滨出版的〈犹太生活〉到〈原居中国犹太人协会会刊〉》，《哈尔滨犹太历史文化国际论坛文件汇编》，2006年，第83~84页。

的中文报纸,如《国际时报》也曾出版过一些关于犹太人历史和现实的文章。<sup>①</sup>1920年成立的哈尔滨犹太人免费食堂向包括中国人在内的许多难民提供食物<sup>②</sup>;“S. L. 斯季德尔斯基因为帮助了1921年灾荒中的数百名中国人,被中国政府授予了勋章。”<sup>③</sup>

由于篇幅所限,我们列举了大部分呈现于文字当中的,哈尔滨犹太人与中国人交往的著名事件(请注意,它涵盖了哈尔滨犹太人社区在中国土地上存在了60年的时间历程)。在我们看到的资料中,无论当时的中国人,还是当时的犹太人,他们对双方交往的回忆,基本上是零星的、片断的,主要集中于中国儿童和犹太儿童的范围,成人之间的交往除去奥尔默特在双城的1年之外,主要对象是中国医生与犹太人患者之间。<sup>④</sup>

### 三、哈尔滨犹太人与中国人交往“有限性”的原因

造成在哈尔滨生活的犹太人与中国人交往不多、交往不深的原因也许并不难被我们列举出来,它们与近代中国的国际地位、远东的地区局势、犹太人自身的凝聚力、在哈尔滨生活的时间长短等都有密切关系。

第一,这种交往的有限性与近代中国人在西方人眼中的低下地位有关。换言之,近代中国的落后,导致中国人缺乏吸引犹太人的动力。众所周知,中国人在西方人眼中的印象有一个由强到弱的演变过程。18世纪的欧洲对中国的崇拜曾达到了异乎寻常的程度,那些将耶稣会士的报告作为自己观点的启蒙思想家在这方面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世纪后,那些与中国“打过交道”的外国

① 参见1939年8月14日《国际时报》,转引自以色列原居中国犹太人协会:《原居中国犹太人协会简报》(英文副刊),第399期,2009年,第46页。

② 西奥多(特迪)·考夫曼:《我心中的哈尔滨犹太人》,刘全顺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2页。

③ 赫尔曼·迪克:《远东的流浪者和定居者——一个世纪犹太人在中国和日本的生活》,纽约,1962年,第23页。

④ 参见曹增仲:《老封旧片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6~197页;曲伟、李述笑主编:《哈尔滨犹太人》,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41~243页,第355~360页;韩天艳、程红泽、肖洪:《哈尔滨犹太家族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41~142页。另外,虽然近代中国犹太人从总体上说与中国人接触不多,但这并不排除少数例外,如上海犹太人音乐家阿沙龙(Aaron Avshalomov)、著名记者曾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他于1957年加入中国国籍,1964年又加入中国共产党,一直担任全国政协常委。他还参加了《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等重要著作的英文稿审定,为中国对外宣传作出了特殊贡献。沙博理(原为美国犹太人,1963年他在周总理的亲自过问下加入了中国国籍。沙博理长期在外文出版社工作,将中国名著《水浒传》和《创业史》《家》等书译为英文,推向世界)、曾担任过东北野战军第一纵队卫生部长的哈尔滨犹太人罗生特博士(Doctor Rosenfield)等。



人,如做过大清海关总税务司的罗伯特·赫德(Robert Hart, 1835~1911)、马戛尔尼(the Earl of Macartney)、额尔金(Earl of Elgin)等都灌输给了西方另一种对中国的印象。正是由于近代中国政治、经济落后,使得中国在很多外国人的心中更是与“愚昧”“落后”“不发达”联系在一起。<sup>①</sup>当时的中国人在欧洲人(包括犹太人)心目中的地位,我们可以用一个著名的犹太人的例子加以说明,这个人就是相对论的创立者、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1922年底,爱因斯坦应邀到日本讲学,往返途中都经过上海,前后共逗留了三天,他在旅行日记中写下了他的如下感受:

在外表上,中国人受人注意的是他们的勤劳,是他们对生活方式和儿童福利的要求的低微。他们要比印度人更乐观,也更天真。但他们大多数是负担沉重的;男男女女为每日五分钱的工资天天在敲石子。他们似乎鲁钝得不理解他们命运的可怕。但这对于一个想在全世界各处看到社会幸福、经济公平、国际和平和阶级和平的人,实在是一幅悲惨的图像。<sup>②</sup>

在上海,欧洲人形成一个统治阶级,而中国人则是他们的奴仆。他们好像是受折磨的、鲁钝的、不开化的民族,而同他们国家的伟大文明的过去好像毫无关系。他们是淳朴的劳动者,欧洲人所以欣赏他们的也正是这一点,在欧洲人眼里,他们的智力是非常低劣的。爱因斯坦看到这个在劳动着,在呻吟着,并且是顽强的民族,他的社会同情心再度被唤醒了。他认为,这是地球上最贫困的民族,他们被残酷地虐待着,他们所受的待遇比牛马还不如。<sup>③</sup>

在这里,我们不是要指责爱因斯坦,而只是希望较客观地再现当时中国人在外国人(包括犹太人)心中的地位。如果我们认为爱因斯坦的看法应该局限于塞法迪犹太人,那就让我们看看另一个当事人的回忆记录:时间大约是1917年秋天,一个名叫马克斯·斯塔(Max Star)的犹太人从波兰穿越俄国来到哈尔滨犹太人社区。当时这座城市里的中国人给他的印象是:

我调查了中国的贫民窟,了解到那里的情况糟糕透了。庞大的垃圾堆被堆放在街道上,吸引了无数的狗、猫、各种虫类在那里爬来爬去;吸引了无数的苍蝇在那里飞来飞去。贫民窟的人们大部分吃的是发芽的东西,他们的家肮脏不堪。8~10个家庭成员挤住在一个房间里,恶臭充斥其间。即使当你路过一个打开着的窗户的时候,你的鼻孔也会被臭气充满。我看到

① 参见约·罗伯茨:《十九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蒋重跃、刘林海译,时事出版社1999年版。

② 许良英、赵中立、张宜三编译:《爱因斯坦文集》第3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0页。

③ 许良英、赵中立、张宜三编译:《爱因斯坦文集》第3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0~21页。

#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4辑

一堆肉被放置在街中心稍靠右的地方,一个屠夫正在宰杀牲畜,在他正在销售的发黑的、质量差的肉堆中,有成千的苍蝇群集在上边。中国人并不吃太多的肉,只有在节日的时候,他们才切一些肉,把肉和蔬菜混在一起烹炒。沿着街道往下走,看到什么东西正在大壶里沸腾。起初,我以为他们正在融化焦油,并要把它铺到街面上,但我惊奇地发现,他们正在烹煮大麦粥。许多人朝我跑来,恳求道:“大人,给我吃点东西吧。”大麦粥卖3分一盘,于是我帮他们买了一些粥。当他们喝粥的时候,我从他们的脸颊由苍白转为红润的颜色上得到了报答。……12月来到,12月的寒冷令人难以忍受。在中国人待的地方,人们可怜巴巴地挤作一团。尽管事实上我身上只剩下了一点点的钱,但每天我还是会馈送伙食给5个中国人;人们把我围了起来,以万分感激之情紧紧地抓住我的大衣。我从来就没看到过一个富裕的、肥胖的、穿得很暖和的中国人,去关心他们自己的不幸同胞的例子。<sup>①</sup>

通过以上的引述,如果将马克斯对哈尔滨中国人的印象与爱因斯坦的描绘加以比较,即使人们不用“如出一辙”来形容,他们之间的相似性(如中国人的贫穷、愚昧、不开化等)也是不言而喻的。

到目前为止,除一例中犹通婚的事例外<sup>②</sup>,我们没有看到过有关哈尔滨犹太人与中国人有很多通婚的事例或研究报告,没有见到过当时有许多犹太人学习中华文化、语言等方面的信息。仅就当前研究哈尔滨犹太人的情况而言,据近十年来的研究论文、相关人员的回忆、原居中国犹太人协会《会刊》(2002~2010)等的记录,这一结论不仅不能成立,而且相反的意见还很多。如,哈尔滨犹太人“对与中国人之间的联系没有兴趣。只有非常少的犹太人会说汉语、对中国文化有兴趣。他们的仆人和商业伙伴大部分是说俄语、没有反犹倾向的中国人。哈尔滨犹太人避免了一个使他们与他们的俄国同胞一样,陷入灾难之中的环境。出现在白俄报刊的反犹主义和一些偶然发生的对他们的身体攻击与言语谩骂并不普遍。就整体而言,哈尔滨犹太人喜欢当时的和平环境”<sup>③</sup>。“在哈尔滨的极少数犹太人会讲汉语或者对中国文化感兴趣,他们也不与中国人交往。他们的中国佣人和商业上的合作者大部分说俄语,但是(这些人)没有反犹主义情节。”<sup>④</sup>

① Max Star, *In The Lion's Den*, Florida Grower Press of Tampa, Florida, 1964, pp. 144-150.

② 到目前为止,对于哈尔滨犹太人和中国人的通婚,我们知道的只有一例,即伦敦大学国王学院茨维·鲍曼(Zvia Bowman)教授,她的父亲是中国人。

③ 茨维·沙克·曼鲍曼:《中东铁路修筑与哈尔滨犹太社区的起源》,以色列原居中国犹太人协会:《原居中国犹太人协会简报》(英文副刊),2002年,第373期。

④ 茨维·沙克·曼鲍曼:《中东铁路修筑与哈尔滨犹太社区的起源》,以色列原居中国犹太人协会:《原居中国犹太人协会简报》(英文副刊),2002年,第373期。



等等。总之,爱因斯坦以上的记述既可以代表一名外国人对中国人的印象,也可以反映一名犹太人对中国人的评价,在他眼中,中国人与犹太人的界限是非常明显的。

第二,哈尔滨犹太人居住区相对封闭,且始终与世界上其他犹太人社会保持着密切联系,一直将自身的发展与犹太文明发展的最新趋势联系起来,是这种“有限性”产生的非常重要的客观条件。我们在前面谈论过,哈尔滨被实际地分成几个部分。中国大众的经济和文化生活主要发生在“中国城”里(即“傅家店”,今天的哈尔滨道外区)。大多数欧洲人生活在“俄国城”里。“例如他们要求中国人掌握俄语,而不是自己努力去学习中文。在十分宽容的情况下,中国人很快地学会了俄语,还有其他欧洲主人的语言。”<sup>①</sup>“社区实行自治运营,或者说它是一个小型的、强调人性和犹太价值观的、有社会意识的小国。”<sup>②</sup>有意思的是,尽管“中国人不能把俄国犹太人与白种俄国人区别开,但他们并没有遭到任何敌意;相反,很多华人倒非常羡慕他们敏锐的商业意识和生存本能。”<sup>③</sup>在俄国统治期间,哈尔滨犹太人获得了与其他的外国人一样的权利,这使得他们可以以自己的方式生活,“在满洲,他们可以开始一种崭新的生活,同时又不必改变自己的语言和生活方式”<sup>④</sup>。

虽然哈尔滨犹太人社区与中国人的社会文化生活相对分离,但是他们却始终是世界犹太人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与俄国犹太人社区、欧洲犹太人社区、美国犹太人社区、远东其他地方的犹太人社区,乃至后来以色列建国后的以色列犹太人社区保持着密切的经贸、信息联络。从锡安主义的兴起到它们内部之间的意见分歧,从积极宣传复国主义精神到投身于重建犹太国家,从因为自身受到反犹主义浪潮影响而远走他乡到对于遭到反犹主义迫害的俄国同胞进行援助,从20世纪初期对自身拉比的选择到50年代后期社区墓地的迁移,哈尔滨犹太人的政治与宗教生活不仅丝毫没有独立于犹太文明之外,而是保持着与世界犹太文明荣辱与共、生生不息的联系。这种与外界密切沟通、全面开放情况的存在,是哈尔滨犹太人社区与上海犹太人社区保持自身特色的相同点。<sup>⑤</sup>它不仅有利

① 赫尔穆特·斯特恩:《弦裂:柏林爱乐乐团首席小提琴斯特恩回忆录》,李士勋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1页。

② 西奥多(特迪)·考夫曼:《我心中的哈尔滨犹太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0页。

③ 茨维·鲍曼:《1931~1945年日军占领期间的哈尔滨犹太社区的命运》,曲伟、特迪·考夫曼主编:《哈尔滨犹太人的故乡情》,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72页

④ 鲍瑞斯·布瑞斯勒:《1898~1958年的哈尔滨犹太人社区:政治、繁荣和逆境》,乔纳森·高斯坦主编:《中国犹太人》第1卷,纽约,1999年,第201页。

⑤ 参见潘光、王健:《犹太人与中国》,时事出版社2010年版,第152~153页。

#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4辑

于哈尔滨犹太人坚持自身的传统,有利于社区内部充满活力,而且在客观上也起到了阻碍了他们与中国人交流的作用。

第三,这种“有限性”与哈尔滨犹太社区存在的时间过于短暂有重要关系。从1903年哈尔滨犹太宗教公会建立至1963年解散共约60年的时间,这对于两个文化迥异的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过于短暂,更何况外部世界的战争、动荡加深了这种陌生与阻碍。同时,犹太人的离散历史也使我们知道,他们已经形成一种身处外来文化氛围下的自我保护意识,这种意识使得他们力图从主观上发扬本民族传统,拒斥非犹太的异质文化。我们可以回过头去比照一下开封犹太人的情况:犹太人来开封的年代是宋朝(998)直到19世纪中期,共约800年。在宋、元、明三朝,开封犹太人一直试图维系自己的宗教信仰,传承犹太人的基本宗教礼仪。与后来开封犹太人对中国科举制度认同、讲中国话,尤其是开始与中国人通婚(这使得他们外貌、体质、语言与中国人区别微小)等完全不同,像上海犹太人一样,哈尔滨犹太人始终保持着自身的特点,他们与中国人通婚的事例极少。

第四,这种“有限性”与哈尔滨犹太人自身的传统凝聚力有一定联系。正如当代著名犹太历史学家西蒙·杜布诺夫所说,犹太教是犹太人失去正常自我保护手段的民族自卫手段一样,犹太教在哈尔滨犹太人社区始终发挥着主导性作用。前面已经提到,对犹太人精神生活和现实生活起着决定作用的因素存在(如吉塞列夫拉比、会堂、公墓、学校、各种协会组织),使得犹太教在哈尔滨犹太人心中的地位始终无法被其他意识形态所取代,这也是哈尔滨犹太人拥有向心力、凝聚力、保持自身特点的重要原因。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开封犹太人被同化过程中得到反证。学者对开封犹太人汉化的真正原因的普遍认识有两个:一个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诱导了开封犹太人改变犹太社会传统的价值观念,使信仰犹太教的开封犹太人同汉族知识分子一样,将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希望和追求,由耶和華上帝的许诺,转向了更实际的文庙之中,用自己的刻苦精神、寒窗十年来换取功名利禄。也就是说,“学而优则仕”使开封犹太人自愿汉化。开封犹太人为此甘心情愿地将自己的思想、思维方式、情趣、操守都浸入汉文化之中;另一个是他们的婚姻关系。因通婚使汉族女子成为开封犹太人的家庭主妇,由于在中国的一般家庭中(包括开封犹太人后裔),儿童三岁前的教育几乎都由母亲担任,这就使家庭内部的文化乃至子女的教育迅速为汉文化潜移默化。也就是说开封犹太人之所以被同化的最根本原因乃是失去了原有文化的主体,即犹太教。<sup>①</sup> 这种令开封犹太人汉化的原因在哈尔滨并不存在,T·考夫曼这样写道:

① 参见张绥:《犹太人在中国中原地区被汉化原因初探》,《上海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张倩红《从犹太教到儒教:开封犹太人同化的内在因素之研究》,《世界宗教研究》2007年第1期。



“19 世纪末,俄国犹太人来到了哈尔滨,并创立了新社区。与其前辈不同,他们并没有融合到中国人中去,而是保持了在东欧时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sup>①</sup>

第五,这种“有限性”还与犹太人在中国生活的历史虽然很长,但是他们对中国政治生活没有产生过重大的影响有关系。这一点也许很重要,我们可以从犹太人对日本的影响中找到一些启发和依据。换言之,假如犹太人之于日本人的影响没有了希夫对日俄进程的介入,那么两者的关系一定是另一番样子,而在中国的历史上,没一个犹太人,甚至没有一个犹太社区有如同希夫之于日本的那种巨大影响。对于“犹太人”,不仅绝大部分中国人是陌生的、遥远的,而且作为中国统治的最高层也没有如同日本人一样,拥有一群对犹太人问题极为敏感的“专家”。虽然哈同、沙逊等支持过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国民政府也有过试图在云南等省份移民犹太人 10 万人的计划<sup>②</sup>,但是这些事件要么只是作为一些零星的行为出现,要么只是一纸空文。总体上说,“犹太人问题”没有进入中国的最高领导层的宏观战略之中。这种情况的出现也是与犹太人在中国近现代史的活动范围,主要不在中国政府的实际控制之下有些许关联。<sup>③</sup>

综上,当时居住在哈尔滨的中国人对犹太人生产、生活方面的直接影响较小。如果一定要找出较为典型的中国人对犹太人的影响,那么倒有一个另类的插曲:“许多在中国生活过的犹太妇女,也包括生活在美国的犹太人妇女(也是由那里的中国人传递来的),接受了‘麻将’作为一种赌博的游戏”<sup>④</sup>;“从整体上看,对于犹太社区来说,在 1932 年犹太人的境况也开始好转。城市的犹太妇女们是最早开始学习汉语的人,也是她们最早地把汉语运用于每天吵闹声不断的麻将游戏中。麻将棋子由象牙色的小方块组成,它 5 厘米宽,3 厘米高;棋子上印着各种各样的中国汉字,白底儿。这些象牙棋子被整齐地排列在一个 12 英寸长的木制盒里。当一位女士将她手中的相匹配的麻将子出手的时候,她就会用汉语大声地喊:‘碰!空或出!’一旦那个正确的组合在盒子里被选到时,那位正赢的女士就会把棋子向外翻出,以展现她所赢的棋子,并大声叫嚷:‘麻将!’”<sup>⑤</sup>正是

① 西奥多(特迪)·考夫曼:《我心中的哈尔滨犹太人》,刘全顺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 页。

② 参见潘光、王健:《一个半世纪以来的上海犹太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77~181 页;杨智友:《未完工的诺亚方舟——国民政府筹设犹太人特区始末》,《档案春秋》2011 年第 5 期。

③ 参见王志军:《哈尔滨犹太人与日本人的“河豚鱼”计划》,《犹太研究》第 6 辑,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④ 鲍瑞斯·布瑞斯勒:《1898~1958 年的哈尔滨犹太人社区:政治、繁荣和逆境》,乔纳森·高斯坦主编:《中国犹太人》第 1 卷,纽约,1999 年,第 213 页。

⑤ 雅克夫·李伯曼:《我的中国:1900~1950 亚洲的犹太生活》,耶路撒冷,1998 年,第 39~40 页。

#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4辑

在犹太人与中国人交往有限性的前提之下,我们才会说:“与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交融程度最深、范围最广、时间最长,主要表现在商贸、艺术领域。”<sup>①</sup>正是在这一“有限性”前提下,我们才可能较好地理解一些这方面的论述,如:“在他们一起读书期间(学校是以英语为主的基督教青年会和以俄语为主的多种技术学校——笔者注),犹太年青人与中国学生自由地混在一起。”<sup>②</sup>“另一方面,犹太人与中国人的友谊是非常好的(excellence)。”<sup>③</sup>

---

① 潘光:《近代以来中国境内的中犹文化交流》,潘光主编:《犹太研究在中国(三十年回顾:1978~2008)》,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年版,第290页。

② 赫尔曼·迪克:《远东的流浪者和定居者——一个世纪犹太人在中国和日本的生活》,纽约,1962年,第28页。

③ 赫尔曼·迪克:《远东的流浪者和定居者——一个世纪犹太人在中国和日本的生活》,纽约,1962年,第29页。